

晚清借钱局的设立与演变

王卫平 黄鸿山

晚清的借钱局是以提供小额借贷的办法救助城市失业贫民的新型慈善组织,首先出现在光绪初年的扬州。后来在推行过程中在不同地方还陆续出现了借本公所、便民局、因利局等不同名称。

借钱局的出现

近代以来,特别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事的剧烈冲击之后,扬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家无余资的城市贫民往往只能依靠“印子钱”获得谋生资本。印子钱是明清城市中广泛流行的一种高利贷,因采取按日索还、还毕盖印的借贷方式而得名。虽然《大清律例》规定:“凡私放钱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就是说,放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但晚清时期印子钱的利息盘剥极为苛重,百日之后利息就会达到本金的40%以上。而特别贫困者即便愿出重利亦告贷无门,遂成“强者流为匪类,弱者毙于饥寒”之势。在这一背景下,光绪二年(1876),绅士严寿彭等人主持设立了名为借钱局的救助机构。

借钱局的救助对象是愿意以小本经营谋生但缺乏必需资本的城市无业贫民,其分期还款办法与印子钱较为相似,不过不收分文利息。每户借款金额自800文起至5000文止,属于小额借贷,标准为“钱业相符合”,即根据需本钱的多少而定。贫民申请借款时须按照程序履行手续:首先必须寻可靠的担保及保人的姓名、住址及职业等情况一一登记,借钱局派人访查确认后即可借款;借款数额越大,保证措施越严密;借款后应按期偿还,不能及时归还者须说明理由;无正当理由而拖延还款者由借钱局派人催还,其人再借时将受到减数借给或不借的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借钱局还对救助对象的道德操守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体现在其“十不借”的规定中:吸洋烟者不借,赌博游荡者不借,无家室者不借,无保又不能连环互保者不借,限地外者不借,僧尼道士不借,屠户不借,瓦木匠不

借,兵勇差保丁不借,剃头修足不借。这种做法说明,除了济贫的经济功能以外,扬州借钱局还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色彩,而这正是明末清初以来兴起的善会、善堂的特征。由此可以反映出扬州借钱局与传统慈善组织的传承关系。扬州借钱局开办之初的近3年中,运转非常顺利。虽然借款者均属贫民,却绝少发生拖欠还款的情况。救助效果也比较显著,虽然借款无多,但对谋生乏资的贫民而言却有着“得之则生,弗得即死”的意义。受到鼓舞的主持者们进一步扩大了借钱局的举办规模,出贷本金由1000串增至2000串,通过将每日还款循环借出的办法,光绪四年五月时借钱局的借出资金总额达到4000余串,同时救助2400余户、7000余口的地方贫民。

同年,扬州借钱局章程正式刊布,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上海的《申报》连续刊文介绍,执笔人还撰写了《推广借钱局说》,把借钱局的作用归结为四点:一是“权缓急”。贫民积蓄有限,一日不作则一日不食,借钱局发放的无息借款恰好可以起到救助的作用。二是“警游惰”。借钱局的借款可为这些无业贫民提供自谋生计的机会,使其免于游荡。三是“杜奢侈”。借钱局采取分期索还的办法,使受助者兢兢业业地从事经营,不敢铺张浪费。四为“清盗源”。濒临绝境的贫民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但在得到营业资本后,糊口有资,自然不会铤而走险。总之,借钱局可以“化急为缓、化惰为勤、化奢为俭、化莠为良”,发挥保障贫民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乃至整肃社会风气的多重功能。

该章程见报后,各地屡有仿行之举。至光绪六年十月,《申报》馆已“叠接各县奉行之信,嘱为登入报章”。仿行地区既有江苏省内的常熟、苏州、南京等城市以及樊汉等繁华市镇,也有湖南、湖北、浙江等外省的城镇,甚至北京也有效法,传播速度很快。

关于借钱局举办方式的争论

借钱局的举办方式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如前述的扬州借钱局,由当地绅士或商人举办,地方官府予以一定支持和协助。第二种如宁波知府在光绪八年主持建设的借钱局,为官绅合办。第三种如光绪十三年设立的宁波便民局和武昌因利局,经费来自官府调拨,由官员直接管理。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借钱局逐渐开始出现官营化的趋势。

当评价这几种举办方式时,青苗法和社仓是时人最常援引的事例。青苗法为北宋王安石所创,主要内容是:当青黄不接之时,生计窘迫的农民可从官府贷得钱款救急,待收获后加息归还,年利息在二分左右。社仓最早出现于隋代,后来逐渐衰落,经南宋大儒朱熹改革后复兴,并在明清时期得到普遍推行。清政府规定,社仓设立于乡村地区,由民间择人管理,采取“春借秋还”的方式救助贫苦农民,利息一般为每年一分。

青苗法和社仓得到的评价迥然不同。前者设立之初已遭到猛烈抨击,后世的诟病更是绵绵不绝,而社仓却一直被视为荒乱良策,后人多有赞誉之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差,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采取了不同的举办方式。青苗法由官府举行,存在不肖官吏强借硬收、从中渔利的情况,造成扰民之弊;社仓由民间自行管理,没有扰民问题。

约在官办武昌因利局设立前后,已有人开始担心借钱局有可能发生类似青苗法的弊端。光绪十五年,安徽巡抚陈彝将借钱局章程上奏,希望清廷诏令各地官府推行。亲政不久的光绪帝指出,借钱局不仅“各节殊属琐屑,不成政体”,而且借贷之事本应由民间自理,如果由官方主持,必然会发诸多弊病,因此批复“万万无此办法,所请著不准行”。

光绪帝表明态度以后,舆论风向随之转移。此后《申报》但凡评论借钱局时,皆与诏谕保持一致。虽然清廷只是禁止官方举办借钱局,但事实上,诏谕中所指出的种种弊端并非官办机构所独有,民间办理的借钱局同样可能存在。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手段作为后盾,借钱局又如何能保证借还业务的长期顺利运转呢?所以,对于那些积极推行借钱局的官绅而言,这道谕旨的颁布不啻于当头棒喝。此后,各地兴办借钱局的热潮迅速消退,已经设立的借钱局也有停止运行的迹象。

虽然步入低潮,但借钱局的理念和做法并未销声匿迹。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贫民生计问题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借钱局又显示出复兴的趋向。

民国借钱局的勃兴

民国时期借钱局出现勃兴之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救灾事业中推行,起到临时救急的作用。如1917年,慈善家熊希龄在主持赈济京津特大水灾时,曾设立因

利局309处。

二是逐渐融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成为政府职能。如在1918年,北京市政公所屡次接到市民请求设立“贫民借本处”的呈文,该所随即制定《贫民借本处章程》和《限制借户细则》,在北京分区举办贫民借本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以法规的形式将其规定为地方政府的职能。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中规定:各地方政府“为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人,并保护贫民健康、救济贫民生计”起见,皆需依照规则设立救济院,下设贷款所,对“无资营业或经营农事之男女”发放无息或低息小额贷款,采取保人作保、小额贷款、分期收还的形式,对贫民借本处的做法多有继承。1943年,国民政府又颁行《社会救济法》,其中列举的救济办法仍然包括“资金无息或者低息贷与”。尽管具体做法和名称不断变化,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借钱局的影子。

三是慈善组织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重新开展借贷业务。民国时期许多慈善组织都采取借贷的办法救济贫民。根据抗战时期的社会调查,仅成都一地,除了政府设立的救济院,还有20多个办理无息或低息借款业务的慈善组织。

综上所述,借钱局在光绪初年出现,由于具备诸多优点,一度得到广泛推行,呈现出从江浙地区向全国扩展的态势。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此并不认可,借钱局很快由盛转衰,但其理念和做法并未消失,而是在民国年间再度得到推广。通观借钱局的命运,我们想对以下两个问题略作分析:第一,借钱局的出现,首先是与中国近代以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分不开的;其推广更是借助现代报刊为载体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力。第二,与传统慈善组织相比,借钱局采取的借贷小额贷款的方法,用意在于帮助贫民利用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化“输血”为“造血”,耗资有限而收效显著。这种救助理念和办法,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著有《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等。

黄鸿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等。

序与跋

每个人都是一抹颜色

库尔班江·赛买提

这是一片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风貌的土地,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疆仍然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话题。媒体上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贫困、瓜果和歌舞。人们对新疆知之甚少,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令大众对新疆人多有误解。

本书中,我介绍了100位来自新疆,生活在内地各个城市,工作在各行各业的新疆人。他们讲的是新疆人的经历,说的是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在家乡,他们可以安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在内地,他们被动地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他们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备受困扰。但他们没有选择逃避,或者走向极端,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继续热爱生活,坚守着自己的专业和岗位。他们中不乏成功者,有的更成为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但无论离开新疆多少年,新疆都是他们无法割舍的元素,新疆精神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给了他们鲜明的性格,给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更给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选择。每一个新疆人都是新疆这幅画面上的一抹颜色,即使离开新疆,他们都对家乡有着割不断、抹不掉的牵挂。

我曾拍摄了很多新疆的俊美风光和人文风情,想以这些美好的风光让人们对新疆有所改观。但最后我发现,最真诚、最有力量、还是身边真实的人,是真实。风景、歌舞和瓜果这些表面的事物固然美好,力量却很脆弱,人们只会吸引一时,而一个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才是他们的符号与灵魂。只有每一个个体都能表现出来,人们才会为之所动。既然少数人的错误做

法可能改变一个群体的形象,那么多数人的积极行动更应该能够改善一个群体的形象。现在,最能改变人们看法的就是我自己,以及像我一样从新疆来到内地的勤劳上进的新疆人。个体散发出的力量无比强大,他们是我更应该关注和记录的。

2014年3月开始,我带着相机和录音笔,走了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近20个城市和地区,联络沟通、采访了近500人,收集了100多组人物故事,最终汇聚成了这本《我从新疆来》。其中很多主人公是在看到2014年4月在网络上热传的《我从新疆来》30组图片故事之后,主动和我联系,讲述自己故事的。这些关于快乐与悲伤、梦想与困惑的故事在主人公的娓娓道来中散发着力量,让我为之震撼,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和我相通的经历和心得,让我想起我这30年幸福和艰难的时光。他们汇聚成的大爱让我发现自己还差很多,也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民族和祖国。我在记录他们,同时也是在记录我自己。他们的大爱不仅让我对这个专题更加有信心,也促使我不断前行,去挖掘这个专题中更加深厚的正能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过这平凡、普通的人和故事来重新认识新疆人,更希望这些新疆人奋斗拼搏的精神散发出榜样的力量,来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促使他们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他们勇于拼搏,敢于吃苦。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改变。

(本文为《我从新疆来》一书的作者库尔班江·赛买提所写的编后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10月出版)

《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

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德国历史学家之争”的一场著名争论围绕纳粹罪行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参加争论的有哈贝马斯等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论并不局限于学术圈和思想界,而是在德国的报纸、期刊等公共媒体上展开,因而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在西方世界引起重视。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明确的最终结论,但提出的问题是整个德国社会二战以后虽未明言却普遍关心的,参与争论的学者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角度进入,没有使用过多的学术语言,公众理解起来没有障碍,各方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各自的逻辑非常清晰。了解这场争论,对中国读者解读东亚历史和自己的当代史也很有借鉴作用。

【(德)哈贝马斯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出版】

《甲午两甲子:忆与思》

今年是甲午年,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距今整整两个甲子。岁月远去,伤口也渐渐抚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却是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纪念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宗旨所在。本书由近代史学者姜鸣担任主编,并邀请到宗泽亚、张鸣、雷颐、马勇等知名学者撰稿,为读者多视角多维度解读那场发生在近代史上、在中国人心中记忆深刻的战争。

(姜鸣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本书系作者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蒋廷黻一生经历复杂,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以学者的眼光与头脑进行观察思考,每每有人所未道之处。加之长期身处高位,回忆录中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更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蒋廷黻著 中华书局2014年10月出版)

《黄金时代》

这是一段从显微镜下观看的历史,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只关注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内心,可谓一部人物心灵史。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当我们阅读这些人物的内心时,我们的情感会随着他们的情感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

(傅林著 中华华侨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古典社会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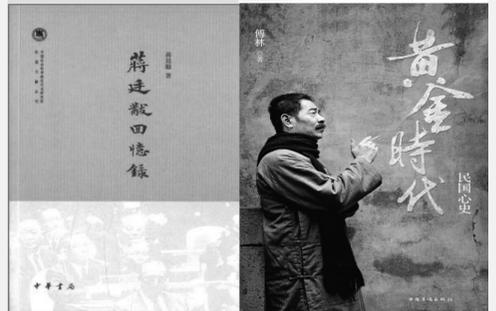
作为畅销美国的社会学理论经典读物,本书自1992年出版以来,已修订至第6版,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美国马里兰大学“杰出大学教授”乔治·瑞泽尔将其在社会学专业领域的多年丰富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相结合,摆脱了枯燥理论的简单叙述。内容全面系统,通俗易懂且简明扼要,不仅涵盖古典社会学家和早期女性社会学家的理论,而且也将米德、帕森斯等被认为与古典社会学理论有着深厚渊源关系的非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纳入书中。本书还增加了社会学史中重要思想家的小传,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观点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美)乔治·瑞泽尔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11月出版】

《流放的老国王》

本书是当代奥地利知名作家阿尔诺·盖格尔的自传体小说,一本感人的关于父亲的书。盖格尔(同名主人公)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疾病让他慢慢丧失记忆和理智,丧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在这种无法阻止的丧失中,父亲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阴影。盖格尔讲述了他如何面对之前从未应对过的疾病,如何与父亲相处并再次建立亲密关系,以及在相处中发现的病中父亲的智慧和生命蕴含的哲理。

【(奥地利)阿尔诺·盖格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推出电子版

本报讯 近日,商务印书馆与亚马逊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学术界颇具影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推出电子版,并正式在Kindle上线。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一套大型学术译著,也是百年商务的品牌图书。自1982年开始,该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14辑600种,所收著作范围涉及文史社科等学术领域,有很多是世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

《美学》等。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罗素·高认为,电子书营销方面的努力,也将促进纸质书的销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表示,此前对该套丛书的数字文档进行了精心整理,确立了XML加工标准规范,首期近200本精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会在亚马逊陆续集中上线。于殿利认为,数字出版的核心还是内容,而技术是重要手段,数字出版的将来是混合出版,是以内容为核心的多介质出版。(田超)

梁培恕回忆“我的父亲梁漱溟”

本报讯 (记者张妮)近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梁漱溟日记》出版方世纪文景、凤凰网读书会之邀在北京出席读书沙龙,回忆父亲梁漱溟的往事。世纪文景同时展出了梁漱溟生平照片和文稿手迹。

87岁高龄的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历经“文革”抄家等磨难而得以留存。他表示,父亲是非常关心国家、社会的人,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的朴实记录中都有展现。谈及父亲对自己的教育,

梁培恕讲到,因为祖父对孩子很是宽容,给他们极大的空间发展自己,因而父亲也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有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像父亲那样对我的孩子放得那么宽”,梁培恕则表示“父亲做到了”。

据悉,近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包括10张梁漱溟珍贵私家照片,及这位“最后的儒家”50年的实录与独白,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实录。

贝当手稿将被拍卖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尚栩)据法国媒体近日报道,集法兰西民族英雄和叛徒之名于一身的亨利·菲利普·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的战争回忆录手稿将于12月18日由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在法国巴黎进行拍卖。

贝当(1856—1951)一生富有戏剧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当带领法军作战,并因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指挥法军击退德军进攻而成为名噪一时的民族英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贝当出任了法国维希政府的元首,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被视为叛国者。

他战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根据苏富比拍卖行发布的消息,即将被拍卖的贝当手稿创作于1919年至1923年间,是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手稿共351页,包含47个章节,77幅插图,详细描述了他参加的每一场战役,记录了部队的行军、战斗、伤亡等情况以及从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值得一提的是,戴高乐将军曾参与过贝当回忆录的编写。

苏富比拍卖行为贝当手稿给出的估价约为25万欧元至3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90万元至267万元)。